



百年禁教

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厉禁

胡建华 著

始末

覽此告示。只可說得而
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而
漢書者。說言議論。今
兄未出告示。竟是和
相同。此片龍言者。其通
西洋人在中國行政。禁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014044251

B979.2
48

胡建华 著

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斥禁

百丰禁教始末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732228

B979.2

4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禁教始末——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厉禁/胡建华
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35-5081-2

I. 百… II. 胡… III. 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清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110 号

百年禁教始末——清王朝对天主教的优容与厉禁

责任编辑 严宏伟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明明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Contents 目录

一、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外国传教士

- 叩击国门 /2
- 利玛窦们的成果 /7
- 跻身清政权的首位传教士 /12
- 顺治皇帝和他的“玛法” /18

二、从禁教谕令到宽容敕令

- “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24
- 平反历狱与“八年禁教谕令” /31
- 康熙皇帝与西方科学 /38
- 宽容敕令与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期” /50

三、从礼仪之争到百年禁教

- 礼仪之争？利益之争 /59
- 礼仪之争争什么 /61
- 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 /71
- 多罗出使中国和康熙帝实行领票制度 /78
- 从嘉乐来华到清王朝百年禁教 /84

四、全国范围的禁教活动

- 雍正初年的福建教案 /96
- 全国各地查禁天主教 /100

五、皇位之争与宗室奉教

- 众说纷纭的苏努案 /107
- 卷入宫廷斗争的传教士 /114

六、来华疏通的欧洲使节

- 教皇特使来华 /117
- 来自葡萄牙的庞大使团 /119

七、“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

- 西洋技艺，尽情享用 /126
- 限制传教，宽猛相济 /132

八、首次因传教殒命的流血事件

- 福安教案的经过 /140
- 由此引发的各地查禁 /150

九、两次江南教案

- 第一次江南教案 /153
- 第二次江南教案 /156
- 传教士安当、呢都前往江西传教案 /159

十、乾隆四十九年大教案

- 大教案发生经过 /162
- 结案后对各类人犯的处置 /167

十一、一张地图引发两起教案

- 德天赐案 /175
- 旗人习教案 /180

十二、清廷禁教的制度化

- 制定《西洋堂事务章程》 /187
- 颁布《天主教治罪专条》 /191
- 严禁西洋人刊书传教 /197

十三、嘉庆朝其他教案

- 马齐案 /203
- 李多林案 /204
- 蓝月旺案 /207
- 袁在德案 /208
- 刘汉作案 /209
- 刘方济各案 /210

十四、禁教政策的废除

- “只有战争才能将中国开放给基督” /216
- 废除禁教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 /224

十五、清廷禁教原因和影响

- 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231
- 对外国势力东侵的本能反应和抵制 /235
- 禁教的影响是深刻的 /239

参考书目 /246

附录：《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250

后记 /266

一、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外国传教士

基督教进入中国，历史上共有四次：分别是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和鸦片战争前后的新教，由于基督教的前两次入华时间短、规模小，加之传播范围仅仅限于一些统治阶级上层或部分少数民族当中，对中原文化特别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影响不大，历史上留下的印记不多。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真正形成比较大规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来华当属首次。

从16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加紧海外扩张；西方教会势力特别是天主教，也积极向美洲、亚洲和非洲地区拓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梯山航海九万里”来到中国。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比较强盛，采取在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家那种“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十字架”的传教方式是不行的。因此，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团体，为了能够实现向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目的，制订了适应中国社会的传教策略，用学术和科学为传教手段，打出“合儒、补儒”的旗号，以尽可能减少异质文化的阻力。到清顺治、康熙时期，天主教在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几乎各地都有教堂，传教士足迹遍布全国，甚至出入宫廷，在朝廷担任要职，中国的天主教徒达到30万人。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传教和实现本国利益，但是由于这种对华的特殊传教方式，无意中架起了中国和欧洲国家联系的桥梁。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传教士们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接触，对中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欧洲主要国家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天主教在华势力的发展，特别是天主教本质和排他性，

以及西方国家传教背后的政治目的，造成剧烈的冲突不可避免。传教士内部、不同修会之间，挑起了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礼仪之争”，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也被卷入其中。

“礼仪之争”暴露了文化背后的政治之争、主权之争，对中国的统治秩序和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最终，清朝统治者对来华天主教会从优容转为厉禁，康熙皇帝制定禁教政策，开始在中国全面禁教。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教令颁布之日起，到1844年鸦片战争后被迫解禁，这场禁教长达127年，史称“百年禁教”，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个时期。五朝皇帝都实行禁教，虽然情况各异，禁教各有特点，但总的趋向是愈演愈烈，禁教政策也更加明确和制度化，被不同程度地严厉执行。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为此遭受重大打击，与此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基本因此停止。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研究和了解清代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都绕不开传教问题。特别是清朝政府对于天主教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禁教政策应当是研究的重点。其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方式是什么？清朝统治者为什么对天主教从优容到厉禁？禁教政策是在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内容和措施是什么？执行的过程和程度怎样？禁教政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禁教政策又是如何解除的？我们对这一政策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文化交流与汇通？等等。

由于清朝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是从明末发展而来的，清代耶稣会所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路线和科学传教策略，也是沿袭前朝传教士的做法并加以发扬，作为引起礼仪之争的根源之一，最终导致清政府对天主教制定和实行了禁教政策，因此，谈到清王朝的禁教，有必要对明末传教士的来华情况加以简单的回顾。



叩击国门

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后，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世界的殖民欲望。欧洲

强国的统治者为了征服和占领新地区，大量掠夺财富，互相之间展开了激烈争夺。一方面，他们争相派出舰队和商船在世界各地疯狂扩张，直接使用武力侵略和掠夺北美、非洲，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为了在精神上奴役和皈化当地人民，则积极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渗透，因此，传教布道就成为海外殖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东西航路的开辟，为传教士们从海路到达全球各地提供了可能。罗马教廷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弥补天主教会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所受到的损失，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的口号，在积极支持葡萄牙、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殖民活动的同时，不断策动各修会派遣传教士到海外传教。被称为“耶稣连队”的耶稣会就是这些修会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

耶稣会在当时新建的修会之中最为活跃、影响也最大。它是由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在巴黎创办的。1540年9月，经罗马教皇保禄三世颁谕批准正式成立，并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耶稣会组织严密，倡导为了天主教事业的彻底奉献精神，其管理上具有军事化的特征，在接纳成员和培训会士方面极其严格。耶稣会主要致力于海外发展，不要求其成员住修道院隐修，而是适应罗马教廷扩张势力的要求，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在上流社会扩大影响，以及分赴世界各地开展传教活动。

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有很多出身于贵族或中产阶级家庭，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中，有21位出身于大学学界，有16人出身医生家庭，这对于耶稣会士在华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有能力以学术和科学作为传教手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视野开阔，有很好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比较了解，对异质文化有一定的包容性，传教手段相对灵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明清时期天主教来华是从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开始的。方济各·沙勿略1540年加入耶稣会，次年，他奉葡萄牙国王敕令，作为教皇保禄三世的大使，赴远东传教。其足迹遍及印度、东南亚，1549年到达日本。

在日本，沙勿略发现日本社会文化深受中国影响，认为要皈依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首先要到中国传教。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讲述当年情况时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①于是，沙勿略决心必须尽早地前往中国，争取中国人的皈依。他认为，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更容易争取日本人，并把福音从中国带给亚洲其他国家。

1552年1月29日，沙勿略在致欧洲耶稣会的信中说：中国拥有很多杰出的人才与高深的学士，他们极重视学术，并且以为研究学术是一件顶光荣的事情。所以派往那里去的传教士，更应有高深的学问，能够应付种种难以解答的问题，对哲学应当彻底明了，还要具备天文、地理等丰富的知识。这就为日后耶稣会在中国采用适应路线，制定借助科学文化布道的传教策略作出了大胆的设计。

由于明王朝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方济各·沙勿略经过各种努力却始终没能进入中国内地，直到1552年病逝于中国的上川岛上。沙勿略的最后十年，完全投入到印度、日本和中国等远东的地区布道事业当中，为耶稣会多个传教区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寄出报告和信件，在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引起各国君主和教会对中国这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度产生了极大兴趣，也激发了传教士们航海东来的狂热与冲动。此后，不断有不同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来。据德礼贤统计，在沙勿略和利玛窦之间，有25名耶稣会士、22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斯定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不断地叩击着中国的大门。但是，所有办法几乎用尽，无论是葡萄牙国王的公使，还是雄心勃勃的传教士，都未能突破中国的藩篱。

明末清初，天主教进入中国并得以顺利发展，是与沙勿略之后另一位重要人物分不开的，他就是意大利人范礼安。范礼安1566年加入耶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128页。

稣会，1574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传教区的教务视察员。1578年，范礼安从印度抵达澳门，在澳门至少滞留了10个月。借此机会，他比较详尽地了解了中国的形势，领略中国文化，也体会到进入中国传教的艰难。有一次，他从澳门学校观望窗外的对岸，情不自禁地面向中国大陆呼喊：“岩石，岩石，你什么时候会敞开！”

通过考察，范礼安认识到，必须改变以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门传教时的思维方式和传教手段，否则向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将永远也不会展开。由于当时葡萄牙的传教士们思想保守和行事僵化，凡入教者必须葡萄牙化：要学习葡萄牙语言，取葡国名姓，穿葡国人的服装，生活方式和习俗也都要葡萄牙化，“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①虽然他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收效甚微。范礼安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大规模归化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国家不但无效，而且可笑。他认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决不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摧毁或取代当地文明。而只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精通中国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相互影响，通过利用天主教使中国文化更加完善的实际效果，最终达到皈依中国民众的目的。^②

1579年7月和1582年8月，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接受范礼安的委派先后来到澳门。利玛窦为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他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安柯那省马赛拉塔城，曾在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加入耶稣会，后来在印度果阿传教。来到澳门后，利玛窦与罗明坚认真刻苦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作准备。

经过不懈的努力，利玛窦与罗明坚于1583年10月进入肇庆。通过观察，他们认为立即进行宗教活动是不明智的，于是，声称自己是因向慕中华文化而来，避而不谈传教的事情。他们知道要适应中国的习俗首先要从着装上开始，这也是当年沙勿略在日本行教时的经验。最初，利玛窦等人穿上僧人的服装，但很快发现僧人的社会地位不高，而且受到文人的鄙视。在儒生瞿太素的建议下，他们改穿儒士的服装，采用儒生

①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版，第169页。

②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9—160页。

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很大，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减少传教活动的阻力，而且还可能取得官方甚至皇帝的支持。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里，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准许，任何事情都是难以进行的。于是，利玛窦决定走上层路线，尽力与有影响的士大夫结交，而不急于追求从教者的数量，他认为，争取一名士大夫入教，要比争取许多一般教民更有价值。

利玛窦意识到，如果想要天主教在一个非天主教国家有较大的发展，就要具备这样一种条件：要么改变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体制；要么教会在某些方面必须适应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前者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出，“按照上帝的安排，对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候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帮助人民关心基督教”。^①基于这种思想，利玛窦制定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利玛窦规矩”的适应中国社会实际的传教路线。

利玛窦等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习中国经典、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上，而且还着力著述和翻译书籍。利玛窦刻苦钻研中国儒家经典很快取得成效，他能熟读《四书》、《五经》，在与文人名士交往时，能够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敬佩。“教内外人士致书请问的，日有多起，辄手自裁达，虽屡屡长言，亦不憚烦。”^②因而增加了士大夫们对他们的认同感，并被尊为“西儒”、“西来孔子”。就连一些反对天主教的人士评价来华传教士时，也坦然承认：“其国人往往有至者，大抵聪明才辨，多有俊士。窦初入中国，一字不识，数年之后，能尽通经史之说。”又有称：“有利马豆者，能过目成诵，终身不忘。明季来中国，偏交海内文士，于中国书无不读。”^③

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利玛窦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古代经典结合起来，主动附会先秦儒学，以儒家词汇作为阐述天主教义理的依据，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0页。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③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6页。

并以儒家自居，明确地表明天主教与中国先秦儒家文化并不冲突，而且是基本一致的。这样一种传教方式，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打消人们对他们的疑虑。

利玛窦还具备渊博的科学知识，这些世俗知识能够更好地促进传教事业的开展。利玛窦认为，传播福音的最佳办法，就是首先使中国人坚信欧洲科学的先进性。他特别为中国人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并用汉字加以标注，而且还很巧妙地把中国放在中央位置并相对缩小世界其他地方，使那些地方成为地图边缘的、微不足道的装饰，以迎合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利玛窦还将万国輿图印制多幅赠与友人，并分送各省，最终进入总督府乃至宫廷。这幅地图曾被多次印制，对中国人改变其地理观念，最初认识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利玛窦制作了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仪器并加以展示，以满足人们对欧洲新奇事物、科学方面的好奇。利玛窦以玻璃棱镜、钟表、万国图、油画等作为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礼物和进献皇帝的贡品，很受他们的欢迎。“从此以后，一切都开始发展，几乎到了繁花盛开的地步。”^①

利玛窦们的成果

1588年，罗明坚返回意大利，天主教在华传教工作落在利玛窦身上。1589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后来前往南京，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利玛窦终于在1601年初抵达北京。

利玛窦在北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他将天主像、圣母像、经卷、自鸣钟、万国图志、西洋琴、五彩玻璃、犀角等献于御前。“万历帝阅览各物，悉令收存，供天主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万国地图，珍藏内府，召玛窦等便殿觐见，垂询天主教旨、西国政治。上命礼部，待以上宾，厚给廩饩，并于京都宣武门（初名顺城门）内东首，赐地居之”。^②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附录，第660页。

②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10页。

在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利玛窦还与当时的朝廷重臣、社会名流交往频繁，极受尊重。《明史》卷三百二十六称：“已而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名公巨卿因利玛窦而信教者多人，或为他的著述作序等，其中有名望的有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冯应京、王征、瞿式耜等人，京城奉教者达 200 余人。

利玛窦 1610 年去世。他临终时告诫其欧洲同伴们说：“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引向极大的报偿，但必须是经过艰难险阻才行。”^①这是利玛窦对自己在华传教经历的总结和对未来天主教在华事业的担忧和期望。耶稣会士西班牙人庞迪我、意大利人熊三拔等具疏为利玛窦奏请葬地，皇帝谕令，将阜成门外滕公栅栏太监私立佛寺及房屋 38 间，地基 20 亩，赐为利玛窦墓地。葬礼举行时，在京的奉教大臣与南京、南昌、韶州诸士大夫都来参加，京兆王玉沙撰文立石以资纪念。

利玛窦去世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全国已经开设教会的有：（1）肇庆府，1583 年建立一处住宅；（2）韶州府，1589 年建立教堂和住宅；（3）南昌府，1595 年建立教堂，1607 年扩建；（4）南京，1599 年建立教堂；（5）北京，1605 年建立教堂，即南堂；（6）上海，1608 年建堂；（7）杭州，1611 年建成开教。^②如果从入教人数上看，利玛窦来华以后全国信教人数不断增加：1584 年，信奉天主教者仅 3 人，1585 年有 19 或 20 人，1586 年有 40 人，1589 年有 80 人，1596 年有 100 余人，1603 年约有 500 人，1605 年有 1000 余人，1608 年有 2000 人。在利玛窦逝世之年，即 1610 年，约有 2500 人。^③

由此可见，利玛窦在世的时候，在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得到持续发

①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613 页。

②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0 页。

③ 参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1938 年版，第 186 页。

展，利玛窦的去世，也没有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欧洲教会派遣传教士的热情很高，其他修会在此前后也纷至沓来。方济各会士、奥斯丁会士、多明我会士已经分别于1579年、1584年和1587年来到中国。而仅1610年就有6位传教士来华，另外4名于1613年抵达。根据报告统计，1624年，在中国有6个传教中心，而在北京有3位耶稣会士和1名辅理修士。在1620年到1629年之间，有19名耶稣会士加入了在华的传教事业。



▲ 现今位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滕公栅栏——利玛窦等耶稣会会士墓地

明朝末年，朝廷亟须西洋人参与修历和防务，因此，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便较少遭到排斥，教务推展因此比较顺利。当明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时，对天主教在华活动更是无力顾及，虽然出现过南京教案这样比较大的排教事件，但传教事业的损失很快得以恢复。而在此后社会鼎革的动荡岁月里，各种势力都在拼死相搏、逐鹿中原，传教士们的活动也表现得异常活跃。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时候，为了达到其目的，传教士们决定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积极为几个政权服务，以确保今后在任何一个有可能建立全国统治的王朝中，占

有一席之地。

在北京，汤若望为明王朝修历，同时还奉命督造大炮，以抵制满族入侵。李自成进京后，曾经对天主教会加以保护。当满族人入主北京后，汤若望又马上转而为其服务并得到他们的信任。

在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中，有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作为“天学国师”为其效力。

明朝政权，自崇祯帝自缢后，皇室中的几名成员先后在南京、福州、肇庆等地称帝。先是福王常洵之子朱由崧称帝于南京，随后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建，改元隆武。隆武帝对天主教比较宽容，甚至曾在福州下谕敕建天主堂。隆武帝败后，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永历帝在位15年，由奉教大臣瞿式耜、庞天寿、焦琰支撑，力图恢复明王朝的统治。天主教在这里获得了特别的优待，耶稣会的传教士瞿安德和卜弥格在永历政权里获得了正式的官位。由于庞天寿的劝告，永历帝的皇太后、皇后、皇长子均受洗进教，在宫中曾设立一所小教堂，供奉耶稣像，朝夕瞻拜。一些太监、大臣和将军也都成为天主教徒，宫中有50人集体受洗，士民入教者颇多。先是，皇太后遣庞天寿等前往澳门作弥撒，求天主眷佑皇家平安，后又分别致书罗马教皇、耶稣会长，希望得到欧洲人的帮助，以挽救其政权。1650年，传教士卜弥格受命持太后的书信前往欧洲，于1652年到达意大利，但直到1655年才获得正式的答复。当卜弥格回来时，两广已被清军占领，太后、庞天寿已死，桂王迁往云南，卜弥格于次年病歿于越南，而瞿安德则死于战乱中。不久，桂王在缅甸被执，南明政权灭亡。

在郑成功的政权当中，有多明我会会士传教士李科罗（亦译为利胜）进行传教活动。郑成功政权当中有很多人是天主教徒，郑成功对传教士们也有好感，曾经表示说：“拜天主，好！”李科罗还在郑成功的官邸对面购置了一所宅院，作为天主教堂，后来又进行了扩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决定选派使节前往菲律宾，李科罗作为郑成功的使节来到马尼拉。次年，李科罗再次为郑氏政权出使菲律宾，与马尼拉殖民当局签订了和平协议。

除了几个政权积极活动之外，明末清初，天主教已经传入除云南和贵州以外的 13 个省份。在边远地区，教会事业也有发展：

在西藏地区，早在 16 世纪下半叶，在印度的耶稣会士就已将搜集到的关于西藏地区的情况报告给教廷。1624 年 3 月，果阿主教派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德·安夸德和马努埃尔·马科斯从印度北部的亚格拉出发前往中国西藏。他们翻越喜马拉雅山西段地区抵达西藏，进入阿里古格王朝首府扎布让传教。1626 年 8 月，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扎布让教堂建成，该教区持续到 1641 年，进入该地传教的耶稣会士达 11 人。1626 年 4 月，葡萄牙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拉和约翰·卡布拉尔等从印度柯钦出发，于 1628 年 1 月抵达西藏日喀则，该教区活动维持到 1632 年结束。此后，以印度为基地的天主教卡普清教会先后派遣 10 批 49 名传教士，来到西藏进行传教活动。

在台湾，天主教是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最早传入的。1619 年，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北部，多明我会传教士随军进入台湾。西班牙人于 1626 年在基隆建筑“圣萨尔瓦多城”，修建教堂，建立第一个传教点。1629 年在台湾的淡水建立第二个传教点。在这期间，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都把台湾当成进入中国大陆的基地，天主教势力向东扩展到噶玛兰，向南传至彰化县，教徒人数达到 4000 余人。1642 年，西班牙人被荷兰人击败，天主教在台湾的发展被迫中止。

大约在 1630 年前后，天主教在海南也建立了传教点。

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介绍当时的形势说：“基督宗教在那种斗争的时代不仅仅在朝廷获得进展，在各省也有类似的进步。关于那个时期的统计数字都很不确定，而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基督宗教团体的大小或所有成员的准确位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会经过迅速的成长，而它的基地仍是长江流域的下部分和北京。一个估算认为，一六二七年的基督信徒是一万三千人分布在江西、浙江、江南、山东、山西、陕西和直隶，而于一六三七年达到四万人。另一个估计认为，一六一七年的基督徒是一万三千人，一六五零年是十五万人，而一六六四年是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八十人。另外还有一个估计说，明朝末年时在所有